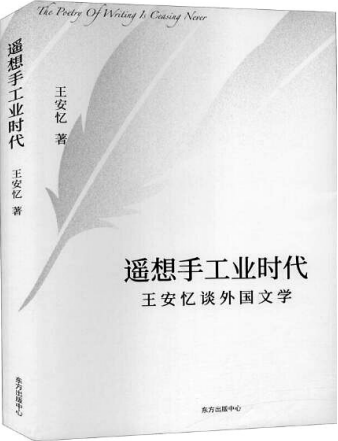


# 如果文学是一门手艺

谷立立

**提示** 弗吉尼亚·伍尔夫谈论阅读,最经典的莫过于“普通读者”的论断。她认为,普通读者读书不是为了做学问,而是出于消遣的本能。王安忆正是如此。她写小说,传授写作之道,更懂小说《遥想手工业时代》就是她的“普通读者”。书中,王安忆放下作家的身份,以普通读者的姿态解



王安忆把她谈论外国文学的新书,命名为《遥想手工业时代》。这似乎是在提醒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它最初的起源。今天的小说不仅门派众多,写法更是五花八门。如果抛开“主义”“派系”的纷

争,单纯地看待一本书,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所有小说都源于“讲故事”的民间传统,在文艺复兴时期被赋予了人本精神,由现代知识分子提炼思想,逐步趋向多元与理性。

然而不管如何变化,小说还是小说,讲故事依然是它的本质。因此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完全可以把小说家当成不折不扣的手艺人。因为创作一部小说,除了要持之以恒地寻找题材、捕捉灵感,更要细致入微地安排结构、打磨句子。这恰恰就是手工艺人的本能。比如《华丽家族》一篇,谈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开篇即提到“享受”二字。显然,王安忆早就悄悄放下传道授业的教师本能,更不以文坛前辈的身份现身说法。

相反,她就是一名“普通读者”,以享受文学的心态对克里斯蒂的小说,从中寻找轻松愉悦的阅读体验。“你可以放弃意义的追寻,径直进入故事。她不会让你失望,一定会有神秘的死亡发生,然后,悬疑一定有答案。”问题是,克里斯蒂是怎么写小说的?答案是织毛衣。只要几根竹针、一团毛线,在脑中盘旋往复,思考一番,就可以“生发出无穷无尽的花样”。

至于克里斯蒂编织故事的线索呢,当然是世间复杂多变的人性。表面上,她的故事并不那么现实,但实际上,她的人物“分明”是生活中的面目,情节也是根据日常的情理”。有了这样的设定,王安忆索性放开手脚,把克里斯蒂的小说掰开了,揉碎了,反复对比,细致揣摩,从不同侧面加以类比,寻找悬疑的答案。这种寻找,显然是过瘾的。于是到了最后,她在不知不觉中写出长文,大约也算得上是

“阅读的至乐”了。

再比如《乔伊斯的脸》。大概没有人会知道,当王安忆饶有兴味地说起乔伊斯时,她脑中浮现的既不是乔伊斯的写作技法,也不是应该如何逐字逐句地解读《尤利西斯》。提到乔伊斯,她竟然不由自主地想起他那张“很不像爱尔兰人”的脸。那么,什么才是标准的爱尔兰面孔?“爱尔兰人通常是骨骼粗壮,体魄健康,颧和腮比较宽大,那是由于咀嚼硬实的食物,形成发达的咬肌”。他们的肤色是“粗糙的配色,保留着农民祖先室外劳作饱受紫外线的遗传,兴许还有酗酒的后遗症”。

相比之下,乔伊斯倒是苍白的,“他的脸在黑白照片的混沌底色里浮现,尖锐的轮廓线条划分了这张瘦削的脸,一双表情严厉的眼睛从中逼视过来,鲜明地昭彰出对世人的揭露和批判”。或许,我们可以从这张脸上读出一点儿雕塑的味道。而乔伊斯恰恰就是这样一位技艺精湛的雕刻家:曾经他对都柏林所下的定义“麻痹的中心”,从他笔端疾书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明明白白地镌刻在他“焦虑的怒容”上。毫无疑问,生活给了乔伊斯敏感、脆弱,以及常年不断的精神损害,他又把最杰出的作品反馈给了生活。

这倒不是说,优秀的作品必须慢工出细活,不经长时间酝酿、布局、雕琢、修饰,就称不上是撼动人心的杰作。相反,它预示着某种久远的文学传承。《遥想手工业时代》其中一篇谈到聚斯金德的《香水》。就像标题所说,这个故事发生在遥远的手工业时代。书中对18世纪巴黎的描述,充满古典主义的写实风格。彼时

的巴黎,“人口骤然密集,拥簇在弹丸之地共谋生计。机器还未完全替代身体的劳动,生活运转在手工操作之下,一切都带有裸露无遮蔽的形态”。

而艺术就产生在这种“裸露无遮蔽的形态”里。它与日复一日的劳作紧密相连,混杂在“粗犷”的体力劳动中,变成一种类似技能的玩意儿。这种个体的生产方式所生发出的交易形式,也是个体性质的,没有公共法则、普遍原则,而是因人而异”。而作家呢,如果想要创作一部经典之作,首先必须拥有一双无所不能的“神的手”,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从平凡之中淬炼真知灼见。就像《香水》的主角格雷诺耶,他异常敏锐的嗅觉“是手工业劳动历练的结果”,并在持续多年的劳作中反复强化,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承,渐渐由量变到质变,“陡然成为本能的禀赋”。

文学正是如此。因为写作就是代际传承的产物。就像攀登山峰,后来者一步一步紧跟前人的脚步,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最终有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又像俄罗斯套娃,从大到小一个一个个依次揭开,直到最后最小的那一个。比如《浮士德》。从1768年到1832年,歌德用了6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巨著。事实上,在他动笔写作的200年前(1587年),就有了《魔术师浮士德博士传》。而在之后的若干年里(1588年、1599年、1674年、1725年)相继有不同的版本问世。很难说,在创作《浮士德》的时候,歌德有没有看过这些作品,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它们的影响。但至少,我们可以从他的写作中看出文学的纵向发展脉络。

毕竟,没有哪位作家能够真

正摆脱上一代人“影响的焦虑”。他们写小说,既是独立的创作,也是文化的延续。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安忆为何会从埃莱娜·费兰特的小说《那不勒斯四部曲》里读出一点儿《呼啸山庄》的味道,更将安妮塔·布鲁克纳的《杜兰葛山庄》与E·M·福斯特的《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相互类比。甚至,如果耐着性子看下去,你会发觉那些发生在杜兰葛山庄里的故事,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有着相似的悬疑——相同的文化渊源造就了这些小说。至于观念的不同、内容的差异,不过是新瓶装旧酒的把戏了。

同样,大约没有人会料到王安忆竟然会从约翰·威廉斯的小说《斯通纳》里读出凡高、鲁迅、张爱玲才有的气质。这倒不是“脑洞大开”的胡乱攀扯。因为艺术之所以引人入胜,就在于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共通性。王安忆显然深谙此道,于是才能从少年时代的斯通纳在田间地头劳作的场景,联想到凡高的画作《吃土豆的人》与鲁迅笔下的阿Q、闰土,“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

自此,这些原本不在同一个时空、同一种文化里的虚构人物,被赋予了共同的基因,终于走到一起,印证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文学没有国界,不分先后;它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就像流传千年的手工艺,“许多时代过去了,另一个时代正在到来,然而,有一种强大的传统,其实潜在时代的内里,它可能是以某种虚无的方式存在着,比如文学,这柔软、轻薄,却坚韧的身体,已经,并且还将继续地穿越过时间的黑暗隧道,将世界上所有的神圣之城,完好地一代交给下一代”。

## 钱穆和他的舍监老师

吴伯雄

近读钱穆《师友杂忆》,其中写到他在中学读书时候,与舍监(即宿舍监督员,兼思想训导工作)老师陈士辛之间的种种趣事,读之忍俊不禁,略加释述,与读者共享。

钱穆写道:“越一年,来新舍监陈士辛师,风度气象,显与元博、伯琮师判然两型。”

钱穆生于1895年,1907年(虚岁13岁)进入常州府中学堂读书。这里的“越一年”即1908年。元博、伯琮两位老师,是钱穆和同学们平时非常尊重敬佩的老师,这里说“判然两型”,显然是“春秋笔法”,这位新的舍监,为人古板,没有生气,平时经常板着一张脸,终日看不见笑容,几乎没有一个学生喜欢他。

不但不喜欢他,这群调皮的学生,还经常合起来跟他对着干,其中尤以我们的钱穆同学为甚。

比如,每天晚上定时熄灯,这位舍监规定熄灯后必须睡觉,不许出声。而且,每天晚上都要拿着一个小电筒,去各个寝室巡视。

有一天晚上熄灯后,钱穆同学与睡在他上铺的兄弟聊天,恰好舍监巡视经过,听到说话声,训斥了一番,并且放下一句话:“爱说话的同学,可以来我寝室跟我说话。”

这当然是一句威胁的话:你们这么爱说话,那就来我寝室跟我说话嘛。

没想到,钱穆同学听了这句话,故意“反话正听”,真的就穿起衣服,悄悄地尾随舍监下楼。这位舍监也许是巡视太投入了(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是钱穆同学脚步太“轻巧”了,其目的当然是想在深夜半夜吓一下这位舍监老师),直到走近舍监的寝室,有电灯光了,才发觉到有人跟随,而且是钱穆同学。

舍监回过头来问他:“为什么不睡觉跑来我这里?”钱穆同学答曰:“谨遵老师训导,前来跟您谈话。”

舍监老师想必是既好气又好笑,呵斥赶紧给我回去睡觉!偏偏我们的钱穆同学不依不饶,喋喋不休。

不知道钱穆同学有没有从盘古开天辟地聊到舍监老师的七大姑八大姨,从他

写的“师屡斥速去睡,速去睡”这句话中,我们可以脑补出这样的画面:钱穆同学故意要拉着舍监老师说话,舍监被缠得没办法,呵斥多次“赶快睡觉去”之后,钱穆同学才离开。

此后,钱穆就成了舍监眼中的刺儿头,当年的“操行分数”(应该也就是思想品德分)只给了钱穆25分(满分100)。同样得25分的,还有另外3个人,合起来100分。这4个人在同学之口中碑本来就不错,经过这25分风波之后,同学们更是对其刮目相看。

这位舍监教修身课(应该也就是思想品德课),每周仅一小时。他自己啰唆爱教训人,教导学生说得最多的,却是:“少说多做,行动重于语言。朴讷话少的,未必就是小人;口才好、文笔佳的,未必就是君子。”

于是,有一天月考,同学们就聚在一起合计,约定每道答题不得超过20个字,也不许费时间去修饰言辞,半个小时之内必须交卷。全面贯彻舍监兼训导长

“士尚行,不尚言”的教诲!

遇到这种机会,平时一贯爱出风头的钱穆当然不会放过。他本来就坐在第一排,加上手疾眼快,才思敏捷,这位舍监老师刚在黑板上写完4道题目,钱穆就写完了答案,第一个交卷,扬长而去。

其他同学也都在半个小时之内陆续交卷,回去之后,聚在一堆,哄然大笑。有两个同学答题超过约定的字数,被旁边座位的同学告发,于是大家判定罚这两个同学买两笼馒头,请全体同学吃。一大堆人围着热气腾腾的蒸笼,肆无忌惮地大嚼大咬,大笑大叫。舍监赶来,看到场面如此热烈,又气又急,却又无可奈何,只好“悻悻然而去”。

谁能想到,这样一个调皮捣蛋、桀骜不驯的学生,后来会成为一个沉静沉稳、著作等身的国学大师呢?钱穆先生的事例或许可以给大多数中小学教师一个温馨提示:不要一味训斥甚至蔑视那些调皮捣蛋、不服管教的学生,说不定未来他们一不小心,就成了一位国学大师。

**提示** 提起故宫,总会想起那句“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巍巍紫禁城,见证了中国几百年的风云变幻,诉尽了两个王朝的兴衰浮沉。这里的重重宫阙、层层楼阁是巧夺天工的艺术精品,更是记载历史的鲜活档案。祝勇的《故宫六百年》聚焦故宫建筑和史事,以时间为纵坐标、空间为横坐标,使时间碎片依附建筑空间,引领人们在历史拼图中感受整个民族对美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回望中国人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

如果去北京旅游,多数人都都会去一下故宫,因为这里不仅有红墙黄瓦、雍容典雅的恢宏建筑群,还包罗了中国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历史文化的演变进程。这座昔日的王者之城,吸引普通民众想一睹真颜,专家学者对它也是青睐有加,对它的研究和书写一直未断。去年,在故宫600年华诞之际,市场上出现了好几本题为《故宫六百年》的著作,但不同的《故宫六百年》仅是其中一部,并不同于其他同名书目的是,这本书并不是全面讲述帝王的家史,也没猎奇龙椅背后的故

事,而是带着今人的视角去看故宫里的人与事,在平视的态度下平和、平静地呈现历史,在对建筑方位和规制的讲解里,在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描述中,在对古代文化传承的探索间,引领我们感受历史星空的浩瀚、个体生命的喜乐和传统文化的精深。

祝勇的《故宫六百年》是他书写有关故宫的第八本书。作为故宫博物院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一直致力于讲好故宫故事,先后写了《故宫的风花雪月》《故宫的隐秘角落》《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等多部作品。对于《故宫六百年》这本书,光看题目就能感受到他在历史长河深处打捞的烦冗,虽然祝勇认为故宫的故事讲上一千零一夜也讲不完,但此次他独辟蹊径地采用以空间带时间的结构,让历史往事依附建筑空间,使其对故宫的讲解抛去了沉重,变得轻盈自由。

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的故宫,是明清时期的皇宫。这里的每一个建筑空间都不仅受过数百年风雨洗礼,也承载了代代君王的前尘往事。《故宫六百年》把亭台楼阁、宫阙轩堂与史事讲述相结合,使大众直观、真切地感受到故宫的时空。在文武百官上朝集合地的午门,帝王的荣辱故事让这里富有传奇色彩。当年,明英宗朱祁镇被瓦剌人俘虏,上百官员在午门伏地痛哭,朝臣们甚至在午门把

宦官党羽暴揍至死;弘治皇帝在儿子朱厚照刚满周岁时,高兴地“赐百官宴于午门”,但不承想,朱厚照继位后昏庸无能,在午门之外创造廷杖107名官员的纪录。在深宫之中,多处建筑无声见证着各色人物的一举一动。被称作“太子宫”的文华殿,记录了明太子们“出阁讲学”的一幕幕场景;在清皇子的书房中,隐匿着皇子们或勤勉好学者或不学无术的身影;常用来商议军国大事的军机处,见证了雍正和年羹尧、慈禧和奕訢等多位君臣关系的亲疏演变……作者以建筑为载体,在同一个空间里拾捡时间碎片,讲述不同朝代君王统治的故事,从而衔接成一幅较为完整的历史拼图。

对于明清王朝来说,故宫的恢宏建筑代表着皇权的威严和彰显,而在权力帝制的更替间,历代君王的喜怒哀乐和恩怨情仇也隐藏在这里。从明代的朱棣到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历史上有24位皇帝曾住在故宫,故宫是这些皇帝生活的居所,也是他们事业的舞台。透过故宫建筑和藏品书画,《故宫六百年》还原和再现了昔日这些主人的故事,让我们深入了解到君王的更多侧面。比如,明朝时的永乐大帝虽开创了“永乐盛世”,但他的性情却残暴多疑;景泰帝因哥哥被抓而戏闹继上位,可难逃夺门之变而英年早逝;受到太监和宫女的保护才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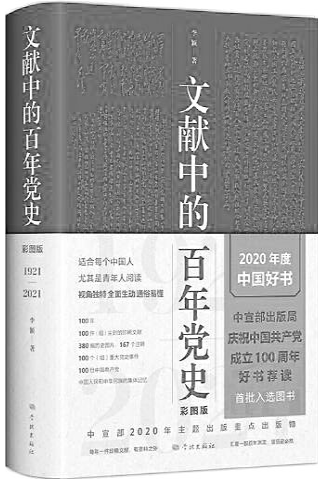
运存活的弘治皇帝朱祐樘,继位后创造了“弘治中兴”的盛世;当明王朝传到朱厚照这个混世魔王手上时,其昏庸腐败、乱象丛生让人大跌眼镜;清朝时,康熙、乾隆虽享有“康乾盛世”的繁华,但他们的后继者终难逃江河日下、国破家亡的结局。在故宫的大主题下,作者着墨讲述多位帝王的故事,在他们难逃情感和无常羁绊的生命里,引领人们了解到明清时期君王的生活世界,体察到在封建帝制蹂躏下人性的多面和复杂。

美国思想家、文学家爱默生说,文化开启了对美的感知。尽管故宫曾经代过皇权和封建制度,王朝的故事中充斥着权术、阴谋、党争、宫斗,但毋庸置疑的是,故宫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正向价值启发和引领人们体会到中华文明之美。坐落于北京中轴线中心的故宫讲究美学对称,宫殿楼阁间隐含着儒家、道家等诸多文化内蕴,各式花园的楼阁、草木和装饰中暗藏着阴阳与五行精髓,《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众多书籍中深含古文明智慧……借着对建筑和文物藏品的介绍和阐释,加之200多张精美的图片助力,《故宫六百年》把多种文化相互交融影响下的建筑之美和文化之美呈现开来,让人们深刻领悟到故宫文化的多元和广博,感受到整个民族对美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如作者所言,故宫是

一座凝聚了中华文明之美的城池。万万千千的劳动者成就了它的美。它不是帝王的私产,更不是什么“遗产”,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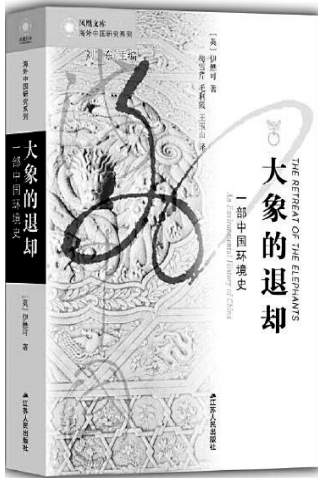
故宫是中华文明的精粹、中华文明的骄傲、人类文明的瑰宝。祝勇的《故宫六百年》对故宫的书写,无疑实现了对中华文明的又一次讴歌和弘扬。著名历史学家阎崇年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就在故宫,这里不仅有中国最重要的藏品,有中国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建筑群,还有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历史与人生。作者从真实的史料出发,以今人的视角和文学的写法,通过对紫禁城600年历史的回顾,展现中华文明在宫殿建筑、园林、绘画、读书藏书等各个方面的巨大成就,在一个个人物与故事的讲述和阐释中,让故宫文化展现出了强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虽然作者认为故宫包含王朝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两面,但他希望人们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更多关注故宫的文化意义,看到其蕴藏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脉,坚守和助推传统文化的传承。因为如作者所言,历史是一面镜子,故宫也是一面镜子,它照见了美与善,也照见了丑与恶……高尚的人从中找到高尚,这高尚滋养了我们的过去,同样也将滋养我们的未来。

■聊书



《文献中的百年党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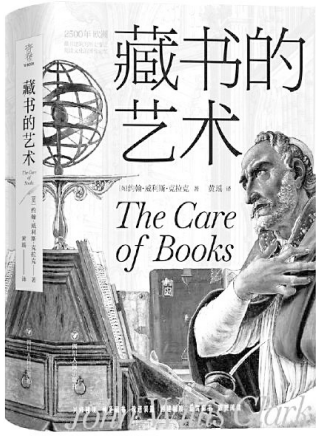
在一个政党、国家、民族的发展历程中,总会发生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成为这个政党、国家、民族的集体记忆。对有着百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些重大事件、集体记忆,就是百年党史这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的点睛之处和关键历史节点。本书取100个(组)重大事件,每个(组)重大事件既能独立成篇,深耕细作,又特别注意大历史背景和后续结果等相关延伸内容,这样前后接续,点面结合,串联起中国共产党100年奋斗历程,构成一部简明百年党史。



《大象的退却》

连日来,15头野生亚洲象在云南一路“逛吃”北迁的消息刷屏各路媒体。据报道,象群从西双版纳一路北上,经普洱市墨江县、玉溪市元江县、红河州石屏县后抵达玉溪市峨山县,目前已进入昆明市晋宁区双河乡,几乎跨越了半个云南省。亚洲象如此长距离北迁,在我国尚属首次。

其实,这次“北漂”可谓是大象不断向南退却后的一次“返场”。伊懋可在《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一书中指出,3000年来,野象的步步撤退与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从北向南的节节推进几乎同步。此次“返场”,无论是从环境保护还是从经济、历史等角度,都有更为深刻的原因值得我们去探索、去讨论。



《藏书的艺术》

本书是2500年欧洲藏书物质文化史的一部开创性著作。全书围绕欧洲的藏书建筑、藏书制度、藏书装置、藏书类别、藏书插画以及众多藏书故事而展开。克拉克走访欧洲各地,从古代亚述、希腊和罗马的文献收藏室,到中世纪的修道院藏书室再到近代的公共图书馆,系统梳理了2500年欧洲藏书建筑的历史变迁,讲述了人们因追求知识和真理而写书藏书并为此兴修建筑、创设制度、改进装置和设计工具,这一系列行为如何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敬畏阅读和尊崇智识的社会文化。